

1104

海盐文史资料

第 3



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目

录

读邹韬奋先生狱中致先父书有感·····	张树年
张元济先生二三事·····	吴侠虎
附：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	
关于张元济捐赠住宅考·····	杨成其
回忆查今文同志·····	徐肇本
我所知道的查今文·····	汤保荣
记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的海盐	
青年革命斗争生活片断·····	徐肇本
简述海盐人士开办的酱园业·····	马季良
闲话土山·····	周穆之
忆海盐《朱园》·····	张玉生
更正（来信摘录）·····	富守人

读邹韬奋先生狱中致先父书有感

张树年

去秋，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宋曼英博士寄我一份复印件。邹韬奋先生致先父的书札，为我所未见。此信仅书月日，未署年份。原书写于苏州狱中，从内容看，推算起来当在1937年。展诵之下，感慨万分。益见韬奋先生陷身囹圄，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敬佩不已。原信未见传布，现录全简如下：

菊生先生赐鉴：译诵六月十四日手示，承蒙慰藉，恳挚殷切，溢于言词。此间诸友于铭感之余，尤深兴奋。韬十年前主办《生活周刊》时，即蒙先生爱护有加，赐书勉励。长者扶掖之隆情厚谊，十年来未尝须臾或忘也。此间诸友陷身囹圄以来，个人利害非所计及，惟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则不得不誓死力争。拜读大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获我心。韬等所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韬得闲当作一文介绍于国人，广播先生之爱国精神，努力服膺先生之懿训，为国奋斗，亦即以报答厚爱于万一也。专此鸣谢并颂道安。韬奋敬上六月十六日晨。衡山先生暨章、王、李、沙诸兄均属笔问候。

信中所谈之事我略有所知，现凭回忆所及，陈述如下：

先父是《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从创刊到受封闭，从未间断。正因为该刊言论正直，产生了仰慕之情。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无理封闭。先父与韬奋先生有同业之雅，出于不平，拟向蒋介石南京当局申说，请求开禁，准予复刊。但与蒋氏素不相识，乃邀老友俞明颐（字寿丞）先生之子俞大维（当时任军

工署长)陪同。于1934年夏去庐山面见蒋氏。当时蒋表示与有关部门商量后答复。不久来信。未能同意。此信我见过。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散失。韬奋先生书中“十年前主办《生活周刊》时即蒙先生爱护”。大约就指此而言。

1937³年初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被捕转押苏州^吴县横街看守所。消息传出之后不数天。先父专程去苏探望。除与衡老有年谊。往来素密外。与其他在押的爱国诸君子素无往来。不相认识。乃由衡老——介绍。得以晤面。据说史良同志关押在另一处故未见面。是日一早启程。当天返沪。抵家时已上灯。同年六月中旬。对“七君子”第一次“开庭审判”。先父再度去苏州。与张一麐先生和李根源先生同往旁所。岂料开庭前以“防止有人扰乱”为借口。禁止旁旁听。旁听证作废。先父旁听不成。当天返归。只得发信致以慰问。韬奋先生读了这通慰问信后第三天清晨作复。这就是狱中书札的书写经过和来历。

先父在芦沟桥事变前夕。编著一本通俗性的普及读物——《中华民族的人格》。于1937年五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摘编荆轲、田横等古代人物的英雄事迹。意在表彰我中华民族的人格。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正如《编书的本意》中所说：“这些人都生活在二千多年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韬奋先生在信中表达了忧国感时。在艰难处境中的爱国思想。坚持抗战救国的原则和立场。虽在“陷身囹圄”却不计“个人利害”。“惟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则不得不誓死力争”。无怪这本小书为韬奋先生大为称道。说它“在国艰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

回顾先父与韬奋先生的交往，感触良多。他们虽年龄悬殊。经历不同。惟在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行列中。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和愿望。同时也表达了商务与三联的两位主持人之间互相尊重的友谊。

岁月如流。我已入古稀之年。得睹韬奋先生这一遗札。当然要在思念先人的同时。追怀先烈韬公的厚谊。宋曼瑛博士从海外寄来遗札复印件的盛意。亦当深谢。姑跋数语。以志吾感。

■ 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

· 注：张树年系张元济先生之子，现居上海。

张元济先生二、三事

• 吴侠虎 •

海盐张元济先生是有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他家所藏的乡先哲遗著，有不少经他评校补录刊行，并将这部分书籍移赠与上海图书馆。五十年前他与同邑谈麟祥等欲辑稿李文系，设征稿处于商务印书馆，惜因抗战开始未得完成而罢。

先生尊重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抗战前他因家乡澈浦开设一西医院，应邀前往揭幕。在开幕词中深切期望家乡人士重视医药，勿为迷信所误。因当时乡间患病之人大都喜求神拜佛，勿重医药重迷信，故作此语以告诫之。

先生与亲友通讯时，喜翻用旧信封。因往来信件较多，常由太夫人帮同翻粘。据先生哲嗣树年同志说，当时他翻用之旧信封多半系各流^名写给他的。其节俭之风殊为可贵。

解放后，新建设杂志社因先生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人，特请口述当时情形，此珍贵史料刊于新建设一卷三期上。

先生之言行足以风世者良多，今仅举此二三事。

一九八五年五月

戊戌政变的回忆

· 张元济 ·

张菊老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故锡有图章一枚。内刊《戊戌党锢子遗》六字。兹以八三高龄。远道来京。参加人民政协。本社视为难得之机会。特请回忆前事。由北大同学三人前往访问。细心记录。并将记录稿送请审阅。以求准确。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提到康有为等。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先进者。菊老这里所讲的。很多是书本未见的材料。我们郑重商请。详晰记录。亦正欲为中国史料增加这极可珍视之一页。

《新建设》—— 编者

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祇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的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不在北京。

以后康有为到北京来。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他组织一个保国会。在顺治门大街湖广会馆里开会。参加的人很多。其中京官也有。非京官也有。

是时上文所记的同僚与梁启超等在北京创设个强学会。地点在前孙公园。记得汪大燮和梁启超。同在会中。那时办了一种强学报。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每日发行一小册。后来强学会被住在我对门的御史杨崇伊奏参

了，强学会遂被查封。

当时我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当时的领袖。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再转递进去，当时外面送来各种章奏，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和我，那时我还在总理衙门供职。为甚么召见呢？因为当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一个摺子给光绪，保举康有为和我。

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现中南海）门外，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有为出来，我同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光绪坐在上面，前面放扎着黄桌帟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他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赞成呀！”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

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也不便再说甚么。光绪就把话头转到我们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胡思敬所撰的“戊戌履霜录”说我在上海开办这是错误的)。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学堂聘请二位教员。一是同文馆的学生。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

“通艺”二个字就是严复取的。校址设在宣武门内象坊桥，租了一座大房子作校舍。学堂创办人有：陈昭常（后出任吉林巡抚），张荫棠（后任西藏大臣），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均系部曹，（以上五人均粤籍），夏偕复（工部主事，浙江人，后出使美国）和我。经费无所出。由我和倡办诸人向总理衙门各大臣递个呈文，请他们提倡。张荫桓最为热心，约了同僚数人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一共捐了好几千元。张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光绪对外边的事很熟悉，知道我们在办学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他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问些甚么事我已经忘记了。光绪就叫我你下去罢。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

当日光绪即派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说本来光绪想派他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荣禄阻挠。但此事系得自传闻，不能证实。

甲午战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门起草。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硃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

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的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甚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

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我就通知帮总办瑞良（旗人），他骑马赶采。恐慌万分，即谕同文馆学生来翻译后送进去。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我一个人略识洋文。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

戊戌年六七月间，御史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开学堂。光绪谕准照办。那时守旧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说这事一定要往前走。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秘密事我未参与。不过七月中袁世凯进京之事则属确实。当时袁在小站练兵。光绪召见他之后，就赏他侍郎衔。

八月初，外间风声甚紧。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因为他是日本名人，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伊藤答应接待。初六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当时还不知道政变的事。伊藤对我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他不好明说，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

我们由日本使馆出来，就听到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帘诏下，初八日大家庆贺她垂帘。初九日逮捕康广仁等六人。康有为在政变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国人李提摩太护送他出京。当日南海会馆被围，但抓不到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由日本人带他出走。康有为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没有追到。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荣禄派王修植（字苑生，北洋侯补道，北洋学堂总办）追梁。有人说王头脑很新，对西太后不满，荣

禄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启超。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惯于两面讨好。但此说不能证实。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改穿日本和服。王虽认识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离去。后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十三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杨常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学生，他跑来告诉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时天天抓人，学士徐致靖，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等均下狱。杀了几个人之后就没有再杀了，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新疆，动身时我们都到西郊送别。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由地方官奏请暂留西安治病。张荫桓被充军到新疆迪化，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下诏把他处死。政变后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侍讲学士文廷式等均在内。

当时我仍在总理衙门，两天一班，时外间谣言甚炽，说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静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锡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我就将通艺学堂结束了，把校产造册交给京师大学堂。

政变发生后，我去见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甚么？”因此我也不再说了。

我革职之后，李鸿章派于式枚来慰问我，问我以后如何打算，我说想到上海谋生。过了几天，于再来说：“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替你找事情。”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甚么渊源，祇是长官和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

我到了上海，盛宣怀来找我，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我当时就把严复译的亚丹斯密的“原富”印刷出来。过了半年后公学的总理何梅生暴病逝世，由我接任，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我和他意见不合，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以后

进了商务印书馆。

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发生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西太后杀了五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后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李经过上海时，我去见他，劝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对我说：“你们小孩子懂得甚么呀？”又说：“我这条老命还拚得过。”后来议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视成。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同我去见光绪那一天，翁同龢被驱逐回籍，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对他严加管束，这是极大的侮辱，因为翁是光绪的师傅，平常和光绪甚为接近，致为西太后所忌。我见过光绪后，李鸿章问我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事，当时我就觉得朝局会有重大变化，李只是叹气，那时他也没有权，对于变法事，他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

政变后西太后把光绪拘囚在中南海瀛台内，硬说他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各国驻华使节都赞成光绪的变法，还打算带医生去看光绪的病，所以西太后恨外国人入骨，以后所以激成义和团扶清灭洋之变，一瞬之间，是有因果联系存在的。

在当时环境之下，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断断无成功的可能，当时我们这些人，藉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到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想。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汝成、昌杭、家麟记录）

关于张元济捐赠住宅考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服务商务印书馆长达六十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出版均有卓著贡献。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都能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他德高望重，不谋私利，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发展，也竭尽全力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尤其是将张宅无偿赠送给海盐中学，更是传为美谈。

张宅何年赠送给海盐中学？《嘉兴师专学报》有《海盐名人张元济》一文（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第95—97页）载：“抗日战争胜利后，海盐县中校舍被毁，张元济闻讯后，于一九四六年把祖传三十六间房屋及六亩半宅基地全都捐赠给海盐县中，使学校迅速发展起来。今天的海盐中学的校舍就是在这块土地上逐渐扩建的。”

（同上，第96页）“一九四六年赠送”与事实略有出入的，我经过初步调查与查找资料，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与作者及对张元济研究有爱好的同志们共同探索。

（一）一九四六年是租借而不是捐赠给海盐县立中学。

海盐中学的前身私立育仁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抗日战争时校舍被毁。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海盐县立中学，校舍先借冯宅（冯家花园房屋），因冯氏催搬，中学校长吴鹿鸣与张元济商量，征得他的全力支持，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才迁至虎尾浜张宅。张元济全家居住在上海，他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所收房租是象征性的，因此租金极低。据一九四七年任海盐县中总务工作的吴孝若老师（现任海盐中学总务主任）说：“几十间房屋，每月房租只两石米。”一九八一年六月份海盐中学整理旧图书资料时，还发现张

元济亲笔写的收到房租租金的收据，方模老师看到有四张，年份是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等，是张元济亲笔用毛笔写的字据。如果一九四六年已经将住宅捐赠，就不会收取租金，看来只能是租借。

再从解放前已在海盐县立中学任教的老教师徐世璜老师，老职工张炳仁同志，他们都讲起，“张元济房屋租借给学校，当时已是了不起的事，解放后才把房屋捐赠给学校的。”吴孝若老师因一直管总务工作的，他说，“张元济的房租不是他自己来收取，是送到上海的，他取得房租金额的多少是从不计较的。”

(二) 为什么张元济一九四六年没有赠送住宅

张元济住宅是三房共有的，虽然侄儿张树源由他抚养长大，但处置住宅事当由三房共同决定。当时对待遗产，他还没有考虑赠送，而是今后子孙如何继承的事。张元济给侄儿树源的信中说：“……海盐虎尾浜房屋，系祖父遗产，三房共分，四子无后，承继未定。此产日后当为汝（你）与英弟所共有。一切应公同处置。”（《与源侄》见《张元济书札》第269页）由此可见，张元济当时未捐赠，是因为遗产系三房共分，应共同处置之故。

(三) 赠送的时间

张元济虎尾浜三十六间祖宅，捐赠给海盐中学的确切时间当是一九五二年。

据现任海盐中学教师叶茂森（他在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在海盐中学读书）回忆说：“在一九五二年，当时副校长江健在开大会时，宣读了张元济先生的来信，将全部祖产房屋、宅基地赠送给海盐中学，当时全体师生热烈鼓掌，鼓掌声经久不息。”

张元济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在学校无房舍上课时，以极低房租将张宅租借给海盐县中，这种精神是极为可贵的。解放后，又全部赠送给海盐中学。租借与捐赠虽是不同的概念，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表现了张元济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支持，是值得颂扬的。因为，这是历史，谨将租借和赠送两个阶段分别写清以补《嘉兴师专学报》之不足，是很有必要的。

（浙江省海盐中学 杨成其）

回忆查今文同志

徐肇本

三十年代，我们海盐家乡报上经常登载查今文同志的花边小品文。当时，我在上海当学徒，最喜欢读他的文章，因为内容精悍、思想性强，吸引了无数学生、学徒及小职员们，对怎样做一个有志的青年起到启蒙作用。至今和一些年逾花甲的老友偶尔谈起查今文的品格，都有共同的感受。他的为人正如刘明同志所说……查今文为人正直、思想比较进步，对国民党的腐败很不满……

我认识查今文，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刚解放时，当时我第一次回家探亲。他是我的上一辈。此后，从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八年这六年中，和他却成了同事关系。他在工商联任秘书，我在工商科工作，就经常在一起了。在聊天中，他曾谈过一些关于他早年活动的情况

查今文在青年时候，求知欲很强，雄心勃勃，曾在上海报考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和上海“交通部实业专门学校”（交大前身），考试结果，两处都被录取。但对他出洋留法，感到问题很多，最后决定进入“交通部实业专门学校”。在求学期间，阅读了马列主义书籍，又曾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对马列主义原理在他思想上已初具雏型，是我县接受新的先进思想较早的一位。因此，与黄源同志很接近。交通部实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和他妹夫李济川去山东、杭州、厦门等地的盐务部门做文牍、翻译工作，但因不喜欢“政客”生涯，不久就离去。后去杭州办报，被国民党省党部查封停办。回到海盐与祝静远先生一起创办《东海日报》，因内容激进又被查封。一九三六年初通过钱荣庭关系和祝静远、陆尹耕先生一起进入《海

滨日报》社任编辑，负责第一版要闻，并兼编副刊《火》。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海盐的政治、文教、新闻解体，《海滨日报》也就此停刊。

一九三八年秋，他又曾在《海北日报》任主编，他伸张正义，披露时弊，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深得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尤其是揭发海盐奸商胡仁芳（绰号面老三）事件，恼怒了县政当局，将他扣押起来。对此，地下党员李石农同志向当局提出抗议，支持查今文的正义行为，当局迫于舆论，把他“劝出”才算平息下来。

查今文同志之所以可贵，贵在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在海滨日报停刊后，其中有些人员如刘耀卿、张强哉、钱荣庭结果均分别当上镇长、乡长，抗战时虞云浩跑到孝丰、平阳去找张韶舞谋职，亦任税稽征处主任等职，而查今文则洁身自好。

沈荡镇商会会长干长林，曾被汉奸吴乐君敲诈，敲诈未成，吴扬言要“做掉”（杀害）干长林。查今文知道后，即通知干长林暂避，而干却认为吴乐君不敢如此妄为。结果在一天夜里竟被吴乐君杀害。

一九四一年，他出任澈浦区区长，当时这一带有地下党活动，这乃是“置人于困”的安排。他在任时期，很同情人民疾苦，深受群众拥护，当时有缙家堰的戴富泉、戴富林、陈金荣三名地下党员被抗卫大队捉去关押在澈浦区公所，查今文同志对此，考虑再三认为抗日事大，对共产应团结抗日，于是把公文上的“通同新四军”，改为“新四军通同”。这样变主动为被动。说是供词不确，只是跟新四军带过路。同时对共产党也应该“解结”才是，^{他去找汪锡康}万一激怒了地下党，也恐不好对付。最后汪锡康就交给他去处理。后经县军法官